

青年公平感与决策之实验研究

林惠玲 吴旭阳

摘要: 参考西方公平研究实验范式,以“独裁者实验”“最后通牒实验”和“第三方裁判实验”为模型进行实验设计,研究青年的公平感和决策。实验结果表明,青年大概率地具有倾向于公平的思维、决策或行为;性别对公平感和决策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法学教育的影响较大;被试者的分配公平、评价公平和惩罚公平具有相关性;制度规则对行为公平的影响显著。公平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础,公平感和公平行为仍存在差距,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公平,强化程序公平,同时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

关键词: 青年 公平 行为实验 法律

一、青年公平感及相关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平(fairness)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公平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对公平问题进行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这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作为推动创新和进步的主要力量,青年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其对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感知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决策和对社会的认识。先天本性及后天环境(如接受的教育、生活环境、参与的经济模式以及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青年的公平感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虽然公平感是公平问题的一部分,但两者依旧有区别,公平感不一定能够完全转化为公平决策或行为。因此,深入细致地研究青年的公平感,尤其是“第三方公平”“公平感及公平行为”以及“法律教育等诸方面对青年公平感的影响”等问题,对青年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创新增长和相关制度的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现有研究及模式

关于公平的研究,从古至今有哲理的研究模式(主要是伦理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制度的研究模式(多为法学领域所采用);此外,还有社会调查等实证研究模式(多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采用)。近些年来,在实验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兴起了实验研究的新范式。

现有关于公平研究的经济学博弈实验有多种实验模型,其中一类比较普遍使用的博弈实验模型是“独裁者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这两类实验均由两方进行分配博弈,通常为10个或者100个货币在被试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方为分配方案的提出者,另一方为分配方案的接受者。在“独裁者实验”中,方案接受者仅能被动地接受分配方案。而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方案接受者能够行使否决权;一旦其否决,则两人均不能得到货币。实验经济学对此做了不少实验研究(凯莫勒,2006)和若干神经实验(奎纳等,2006:202-215),涉及各类(性别、年龄、专业、地域等)不同人群的类型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此类双人博弈实验基础上,还发展出第三方裁判惩罚实验模式。其加入第三方作为新要素,并设计各类第三方的地位、权限以及与两方之间的不同互动情景,以此对应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多类场景(Fehr & Fischbacher, 2004(a):63-87)。而第三方裁判实验研究既是制度经济学问题,也涉

及法哲学和政治哲学。

我国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心理学界,对青年公平感问题已经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许多研究,国内学术界有大量关于青年公平感方面的实证问卷调查研究(张光、刘伟伟,2008;熊青,2014;赵德雷,2016;熊青,2013;周兵、刘成斌,2015)。此外,还有若干关于儿童及幼儿的“最后通牒实验”的实证研究(高宏佳,2014;王蕾,2017)。同时,也开始有若干实验以“独裁者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为模型,对公平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吴旭阳,2015;吴旭阳,2017)。

为了从实证的角度研究青年的公平感及其决策问题,本研究借鉴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实验研究模式,以“独裁者实验”“最后通牒实验”和“第三方裁判实验”为模型,从不同角度研究青年的公平感,以此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思考,为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提供若干建议。

二、实验设计

本实验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研究涉及“公平正义”的专业教育(典型的是法学)要素对青年公平感及其决策的影响。分别设计了“自身作为分配者”“被第三方裁判者”“自身作为第三方裁判者”等场景,以及被试者对“第三方裁判者”和“自己决策”的道德、喜好的判断等要素进行多角度研究。本实验以西方实验经济学研究“公平实验”主流的“独裁者实验”为基础进行设计,并结合“第三方裁判实验”模式研究青年公平感问题。

实验设计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独裁者实验”模式。该阶段共计10轮(也称为“回合”,下同),每轮给予被试者A和另外一人B共10个货币。由被试者担任分配者,决定货币在两人之间的分配份额;被试者在实验中可以决定给另一人多少个货币,剩下的货币归被试者。但另一人不能否决分配方案,也不能对被试者进行任何惩罚。在本阶段实验中,实验助手会记录被试者每一轮的分配金额,然后该金额在第三阶段的第11-20轮中逐轮给出,让被试者作为第三方裁判者对该分配数目作出裁判(其实就是自己裁判自己)。

第二阶段是“第三方裁判”模式,分为10轮。在该阶段实验中,除了延续第一阶段的实验条件之外,还新增了第三方裁判者。如果被试者的分配不够公正的话,会受到第三方的惩罚。第三方对被试者的分配方案,进行如下处理:(1)如果分配给B的金额是0、1、2,则第三方的决定为“您本轮已经选择完毕,出于公正,第三人C监管了您的货币分配。第三人C认为您本轮的分配是不公正而无效的”。(2)如果分配给B的金额是3、4,则第三方的决定为“您本轮已经选择完毕,出于公正,第三人C监管了您的货币分配。第三人C认为您本轮的分配是不公正,但有效的”。(3)如果分配给B的金额是5-10,则第三方的决定为“您本轮已经选择完毕,出于公正,第三人C监管了您的货币分配。第三人C认为您本轮的分配是公正,有效的”。此类三种处理结果是根据现有诸多“独裁者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中相对普遍的公平标准进行拟定。

本阶段每轮结束后,被试者均需对第三人作出评判,填写其认为第三方是否善恶,以及是否喜欢第三人。

第三阶段为“被试者进行裁判”模式,共计20轮。被试者转变身份,成为第三方裁判者。系统提示被试者,在被试者之外有“另外两名实验被试者是10个货币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本阶段分成两个小阶段,第1-10轮为A阶段,第11-20轮为B阶段。

第1-10轮(A阶段)由实验助手随机提出分配的方案(分配1-5个货币,下同)。第1-10轮,其实是被试者自己实际作为第三方裁判的情境。被试者对此分配方案进行裁判。裁判的选项有如下三种:被试者从中选择一种裁判方案:一是该分配方案不公正且无效(分配者的货币被没收,被分配者获得货币);二是该分配方案不公正,但有效(两人都获得该轮分配的货币);三是该分配方案公正,而且有效(两人都获得该轮分配的货币)。

第11-20轮(B阶段),由实验助手将被试者在第一阶段作为分配方案的提出者所给出的分配

数目记录下来;将该分配数目作为其他两方中一方提出的分配数目的方式逐轮提出,让被试者对该分配数目进行裁判。第11-20轮的裁判,其实就是被试者作为第三方对自己在第一阶段中作为分配方进行的裁判。对此分配方案进行裁判的选项有三种(如前所述),被试者从中选择一种裁判方案。

本阶段之所以设计为A、B两个阶段,是因为要观察被试者作为第三方对他人随机分配方案(A阶段)的裁判情况;同时还要测试,他自己作为第三方时,对自己作为分配博弈两方时分配方案的裁判评判情况(B阶段)。而实验设计在其自身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自己之前的分配方案进行裁判,这样相对较为客观。此外,为了防止有人记忆力较好,能够记得自己在第一阶段进行分配的数目,从而识破B阶段的设计目的,为此将分配数字随机的A阶段安排在B阶段之前。

第四阶段为“路人甲”模式,共计10轮。第四阶段测试的是被试者是否愿意作为“路人甲”自付成本,作为第三方进行纠纷解决。第四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条件基本相同,但有以下不同:被试者对分配者的分配方案,如果要作出惩罚(即认定“该分配方案不公正而且无效的”,根据分数设计为-1分),则需要从自己以往获得的货币中花费2个货币进行惩罚。

在实验的博弈活动之外,我们还让每个被试者填写心理学的“马基雅维利量表”以测试其“冷静分析”“理性自私”的程度。被试者在实验结束之后,其博弈所得的每个货币可以真实地兑换0.2元人民币(此外每人还获得50元的测试基本报酬)。本实验时间为2018年4-5月。我们的被试者共计113名,其中有效被试者为:法学组被试者共计54人,其中男性27人、女性27名;非法学组被试者共计53名,其中男性26名、女性27名。他们均为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年龄为18-28岁,为典型的青年群体。实验设计的自变量主要是法学专业性,即被试者的法学/非法学专业背景;其次是性别。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设计所使用的行为实验方法是一种实验室仿真研究模式,其仅对能够进行模拟的部分问题进行实验研究,而不能对所有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其效果受制于实验条件,其模拟的情境与现实情境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其通常为单一或若干要素的测试,而现实社会中均为多要素的复杂交互作用。所以实验研究的结论仅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归纳分析研究模式相比,实验模式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定优势,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能够分析出部分确定性较强的相关性关系。

三、实验数据及分析

实验结束后,我们对相关数值进行分析,同时也对其他数值进行分析。针对每个被试者在每一阶段的平均分配金额以及在每一阶段的平均裁判得分进行分析,以寻求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在统计中,我们将第三方裁判的三种选项设定为“得分”选项,该得分的数值与分配的“金额”的数值并不相同。我们的裁判得分设置如下:

1. “该分配方案不公正而且无效的(分配者的货币被没收,被分配者获得货币)”设定为“-1”得分;
2. “该分配方案不公正,但有效(两人均获得该轮分配的货币)”设定为“0”得分;
3. “该分配方案公正,而且有效(两人均获得该轮分配的货币)”设定为“1”得分。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以下的数据和关联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 被试者的分配公平、评价公平及惩罚公平具有相关性

试验数据表明,被试者的分配公平与对他人行为的公平评价(评价公平)以及对他人行为的惩罚行为(惩罚公平)存在一定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被试者自身公平行为模式的一致性——即在分配和惩罚方面都更愿意付出。数据分析表明,在 $\alpha=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一阶段平均金额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成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108和-0.290;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与第四阶段得分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14, 且相关系数显著(见表1)。由于第四阶段的裁判得分越低, 被试者越需要进行自付成本的公平惩罚; 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金额则是由被试者给他人分配货币, 其分配给他人的金额越大, 被试者就更愿意付出, 其分配就越公平。一言以蔽之, 在自己进行分配的场景中, 分配越多者越公平; 同时其在对他人分配场景进行裁判时就越愿意进行自付成本的公平惩罚。因此, 总体而言, 被试者的分配公平与惩罚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表1 各阶段的分配金额

		第一阶段 平均金额	第二阶段 平均金额	第三阶段 A 平均金额	第四阶段 平均金额	第二阶段 平均得分	第三阶段 A 平均得分	第三阶段 B 平均得分	第四阶段 平均得分
第一阶段 平均金额	Pearson 系数	1	.474 ***	-.108	.120	.294 **	.194 *	.711 ***	-.290 **
	Sig. (双尾)		.000	.270	.217	.002	.045	.000	.002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二阶段 平均金额	Pearson 系数	.474 ***	1	.029	.063	.698 ***	.102	.338 ***	-.214 *
	Sig. (双尾)	.000		.765	.521	.000	.294	.000	.027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三阶段 A 平均金额	Pearson 系数	-.108	.029	1	-.035	.047	.351 ***	-.119	-.001
	Sig. (双尾)	.270	.765		.721	.629	.000	.221	.994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四阶段 平均金额	Pearson 系数	.120	.063	-.035	1	-.027	.071	.041	.306 ***
	Sig. (双尾)	.217	.521	.721		.781	.466	.673	.001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二阶段 平均得分	Pearson 系数	.294 **	.698 ***	.047	-.027	1	-.071	.313 ***	-.248 **
	Sig. (双尾)	.002	.000	.629	.781		.466	.001	.010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三阶段 A 平均得分	Pearson 系数	.194 *	.102	.351 ***	.071	-.071	1	.167	.357 ***
	Sig. (双尾)	.045	.294	.000	.466	.466		.085	.000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三阶段 B 平均得分	Pearson 系数	.711 ***	.338 ***	-.119	.041	.313 ***	.167	1	-.165
	Sig. (双尾)	.000	.000	.221	.673	.001	.085		.090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第四阶段 平均得分	Pearson 系数	-.290 **	-.214 *	-.001	.306 ***	-.248 **	.357 ***	-.165	1
	Sig. (双尾)	.002	.027	.994	.001	.010	.000	.090	
	N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类似的, 第二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为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248,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在第二阶段, 由系统根据公平的准则给予裁判, 得分越高者分配越公平。如前所述, 第四阶段得分越低者公平惩罚的行为和意愿就越强烈。

其次, 在对待他人方面, 被试者“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数据与“他人的分配公平性”数据具有一定关联性。在第三、第四阶段, 被试者是作为第三方对他人的分配行为是否公平进行评判/裁判和惩罚。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第四阶段平均金额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306。类似的,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金额与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351。

而第四阶段平均得分既是对他人分配的评判,也是自己的决策行为。他人分配的金额越高,表示对方越公平,同时自己也越不需要付出成本进行惩罚,则被试者对他人分配金额行为的裁判行为得分也应该越高。而第三阶段 A 阶段虽然不是付诸对他人分配不公的惩罚,但也是一种公平的评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可见,被试者在自己“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以及“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并非任意而为,而是根据“他人的分配公平性”的有一定规律性、相关性的反应,是对他人行为的公平评价和裁判惩罚。

最后,在对待他人方面,被试者“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与“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具有关联性。数据分析表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是显著的,相关系数为 0.357;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与第三阶段 B 阶段平均得分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不显著。第三阶段 A 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裁判均表现为被试者对他人的裁判,但第三阶段是内心评判的公平,而第四阶段是基于惩罚公平的裁判,是付出成本的惩罚裁判行动。因此,“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与“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具有关联性。

由上述三个方面的数据可知,青年人的分配公平与评价公平、惩罚公平(行为)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而且他们在自身进行分配以及面对他人的分配方案时,在诸多方面有一致性和关联性。

(二) 青年人大概率地具有一定的公平感

如前所述,不同专业和性别的青年人群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大体一致,因此人群样本中的多数普通人在多数场景下大概率地具有倾向于公平的思维、决策或者行为。此外,还有一些数据也表明青年人大概率地具有一定的公平感或公平性。这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第三阶段 B 阶段,面对自己的高分配比例(平均 4.28 个货币),法学组持肯定态度,认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而该阶段中,非法学组的平均分配为较低的 3.22 个,其对自己提出(第一阶段)的低分配方案也持一种负面的惩罚评价(平均 -0.032 分)。由此可见,法学组和非法学组虽然在行为上的公平性有一定差别(见下文),但均具有一定的公平感。

而从性别看,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均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在第三阶段 B 阶段,当面对自己的高分配金额时(平均为 4.03),男性组的裁判得分较高(平均为 0.26),评判较为正面;而面对自己的较低分配金额(平均为 3.56)时,女性的裁判得分也较低(平均为 0.113),相比较为负面。由此可见,男女虽然在行为上的公平性有所差别,但都具有一定的公平性。

其次,前述在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具有关联性,体现为“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与“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具有关联性。而在具体专业和性别方面也有关联性。

从专业上看,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在一些方面的公平性也较为接近。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被试者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在不同的专业分组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法学组与非法学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83 和 0.357(见表 2)。因此,在“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与“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具有关联性方面,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区别不大。

表 2 不同专业第三阶段 A 阶段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

	法学			非法学			总数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值	.383 **	.431 ***	54	.357 **	.21	53	.357 **	.299 **	107
渐进标准误	.178	.135		.131	.146		.108	.100	
近似 T 值	2.992	3.441		2.728	1.53		3.922	3.211	
近似 P 值	.004	.001		.009	.132		.000	.002	

从性别上看,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三阶段 A 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在不同的性别分组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男性组与女性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75 和 0.338。可见,在“内心对他人的评判公平”与“行为上对他人进行惩罚公平裁判”具有关联性方面,男性组与女性组区别不大。

(三) 法学教育对青年公平感和决策的影响较大

数据分析表明,法学专业教育对青年的公平感和决策的影响较大。虽然前述数据和分析表明,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均具有一定的公平感;但是在公平感、行为公平性的其他许多方面,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依旧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法学与非法学在分配金额和得分方面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中,法学组平均分配给对方的金额为 4.28 个货币,而非法学组仅有 3.22 个货币。由此可见,法学组的被试者分配的数额较为公平。而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可知(见表 3),第一阶段分配的平均金额的 p 值为 0.00,小于 0.05,说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之间的第一阶段平均金额是有显著性差异的。其余阶段,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之间的平均金额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根据对裁判得分的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对比研究(图表数据内容较多,略)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可知,第三阶段 B 阶段平均得分的 p 值为 0.000,说明在 $\alpha =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之间的第三阶段 B 阶段平均得分有显著性差异。其余阶段,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之间的平均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3 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分配对比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第一阶段平均金额		第二阶段平均金额		第三阶段 A 平均金额		第四阶段平均金额	
		假设方 差齐性	假设方 差不齐	假设方 差齐性	假设方 差不齐	假设方 差齐性	假设方 差不齐	假设方 差齐性	假设方 差不齐
方差齐次 性检验	F	20.164***		.003		1.190		1.576	
	Sig.	.000		.958		.278		.212	
均值相等 假设的 t 检验	t	3.642***	3.627***	-.436	-.435	.640	.641	-1.326	-1.323
	df	105	86.559	105	99.168	105	102.956	105	99.141
	Sig. (双尾)	.000	.000	.664	.664	.523	.523	.188	.189
	平均差	1.150	1.150	-.074	-.074	.040	.040	-.079	-.079
	标准差	.316	.317	.170	.171	.062	.062	.060	.060
	偏差 95% 置信区间	下限	.524	.520	-.412	-.413	-.083	-.083	-.197
		上限	1.776	1.780	.263	.264	.162	.162	.039

二是在得分关联性方面,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二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在法学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442;而非法学组不明显。在第二阶段,是系统根据公平的准则给予裁判,得分越高越公平。而在第四阶段,是被试者给予裁判,而且是被试者自付成本的惩罚裁判,其给予的得分越低,则越公平。由此表明,法学组在分配公平和惩罚公平两方面的关联性表现更为显著。

三是量表方面的表现差异不大。因为本实验测试的是马基雅维利量表,量表得分越高则“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能力越强。法学组的得分为 78.83,非法学组的得分为 77.54,两组差异并不大。

然而,数据分析表明,经过专业类别分组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法学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三阶段 B 阶段平均得分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041,但相关系数不显著;而非法学组则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87,且相关关系是显著的(见表 4)。

由于第三阶段 B 阶段被试者是担任第三方裁判者对其他两人的分配方案进行裁判,对分配方案评价越低者,通常能够表明自己作为第三方裁判时越有公平感。同时,在第三阶段 B 阶段(其实是第一阶段的金额),非法学组的分配金额较低,仅为 3.22;所以,对第一阶段的分配金额评价越低者,通常能够表明自己越有公平感。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第一阶段的分配金额其实是自己的金额,对其评价越低者,如果是作为第三方的裁判则表明被试者越有公平感;但这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裁判,所以对自己的分配金额评价越低则公平感与实际分配行为的割裂就越严重(第三阶段的公平感反对自己第一阶段的分配行为)。同时,其马基雅维利得分越高,则体现了“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程度越高者,公平感与公平行为的割裂就越严重。所以,在非法学组中,“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程度越高者,越是在第三阶段的公平感反对自身第一阶段分配不公平行为的人,其前后不一致、言行不一致的程度越高。

表 4 法学组与非法学组的量表比较

	法学			非法学			总数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值	.041	.019	54	-.287 ^a	-.244	53	-.127	-.093	107
渐进标准误 ^a	.146	.149		.128	.135		.098	.095	
近似 T 值 ^b	.299	.135		-2.137	-1.796		-1.308	-.957	
近似 P 值	.766 ^c	.893 ^c		.037 ^c	.078 ^c		.194 ^c	.341 ^c	

注: ^a 零假设不成立, ^b 零假设成立下的计算标准误, ^c 基于常态近似值。下同。

此外,数据分析表明,在量表得分与善恶评判得分对比方面,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法学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二阶段善恶得分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325;而非法学组则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93,同时两组的相关关系均为显著(见表 5)。

由于第二阶段的“第三方裁判标准”是系统所定,根据的是相对普遍的公平标准,被试者对第三方裁判进行善恶评判时,评判善恶得分越高,代表被试者的公平感越符合相对公认的标准。法学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二阶段善恶得分为正相关关系,则表明法学组更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来调整自身对他人进行“第三方裁判行为”的评判,推动其向普遍的公平感靠拢(估计法律知识能够影响自身对他人裁判是否公正的判断)。而非法学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二阶段善恶得分为负相关关系,则意味着非法学组越是“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则越是对“系统第三方的公平裁判”的评价越低。由此我们猜测,非法学组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可能其“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能力更倾向于推动降低对“第三方公平裁判”和他人分配(参见上文关于第三阶段 B 阶段的得分)的评价。

表 5 法学组与非法学组关于“量表得分”与“善恶评判得分”

	法学			非法学			总数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值	.325 ^a	.284 ^a	54	-.293 ^a	-.222	53	.031	.020	107
渐进标准误 ^a	.107	.117		.133	.131		.100	.098	
近似 T 值 ^b	2.476	2.135		-2.188	-1.629		.318	.202	
近似 P 值	.017 ^c	.037 ^c		.033 ^c	.110 ^c		.751 ^c	.841 ^c	

(四) 性别对公平感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

数据分析表明, 青年人的性别对公平感具有一定影响, 但并不是特别显著。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可知,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男女之间分配的金额差别不大(见表 6) 。同在得分方面的 T 检验的结果可知(图表数据内容较多, 略) 第二阶段平均得分的 p 值为 0.038, 小于 0.05, 说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第二阶段平均得分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其余阶段的得分不具有显著性。

但是, 在公平内部不同部分的关联方面,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第二阶段平均得分与第四阶段平均得分在女性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326 ; 而男性组不明显。如前所述, 在第二阶段, 是系统根据公平的准则给予裁判, 得分越高越公平。而在第四阶段, 是被试者给予裁判, 而且是被试者自付成本的惩罚裁判, 其给予的得分越低, 则越公平。因此, 女性组在分配公平和惩罚公平两方面的关联性表现更为显著。

表 6 男女分配对比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第二阶段平均得分		第三阶段 A 平均得分		第三阶段 B 平均得分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方差齐次性	F	8.328 **		.153		2.05		
Levene's 检验	Sig.	.005		.697		.155		
均值相等假设的 t 检验	t	2.095 *	2.099 *	-.109	-.109	1.259	1.258	
	df	105	101.42	105	104.523	105	103.083	
	Sig. (双尾)	.039	.038	.913	.913	.211	.211	
	平均差	.257	.257	-.007	-.007	.147	.147	
	Std. Error Difference	.123	.124	.061	.061	.117	.117	
	偏差 95% 置信区间	下限	.014	.014	-.128	-.128	-.085	-.085
		上限	.5	.500	.115	.115	.380	.380
		第四阶段平均得分		量表得分		第二阶段善恶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等	
方差齐次性	F	0		1.129		29.231 ***		
Levene's 检验	Sig.	.993		.291		.000		
均值相等假设的 t 检验	t	.195	.194	2.841 **	2.845 **	3.545 ***	3.555 **	
	df	105	103.374	105	103.403	105	97.482	
	Sig. (双尾)	.846	.846	.005	.005	.001	.001	
	平均差	.0115	.0115	8.173	8.173	.539	.539	
	Std. Error Difference	.059	.059	2.877	2.873	.152	.152	
	偏差 95% 置信区间	下限	-.106	-.106	2.469	2.475	.238	.238
		上限	.129	.129	13.877	13.87	.841	.840

经过性别分组后,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男性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一阶段平均金额为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299 , 且相关关系是显著的; 女性组的相关系数为 -0.159 , 相关关系不显

著。经过性别分组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男性组的量表得分与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84 ,且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女性组也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025 ,但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表明,男性的“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能力与不公平分配相关联,其越是“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则越不公平。

总体而言,男女之间的公平性有一定差异,在不同问题上的公平性各有自身的优劣。另一方面,在不同数值的相关性方面,法学组与非法学组之间的相关性数值具有较多的显著性,性别方面则较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五) 制度规制对行为公平影响显著

数据分析表明,惩罚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第一阶段的分配中,法学组和非法学组为 4.28 和 3.22 ;而在第二阶段,面对惩罚监管,不管是法学组还是非法学组,其平均的分配金额都达到了 4.7 左右,事实证明制度的规制和惩罚是有一定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与裁判平均得分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98 , p 值为 0 ,小于 0.05 ,说明相关系数是显著的(见表7)。

表7 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与裁判平均得分

	法学			非法学			总数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定序	定距	有效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Pearson 相关系数	Spearma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N
值	.809 ***	.679 ***	54	.625 ***	.61 ***	53	.698 ***	.661 ***	107
渐进标准误	.045	.099		.08	.127		.056	.076	
近似 T 值	9.917	6.666		5.715	5.503		9.996	9.031	
近似 P 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此外,经过专业类别分组后,在 $p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法学组的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与裁判平均得分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809 ,比整体情况时相关度高;非法学组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809 ,两组的 p 值均小于 0.05 ,相关关系都是显著的(见表7)。

经过性别分组后,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男性组的第二阶段平均金额与裁判平均得分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83 ,且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女性组的相关系数为 0.686 ,相关关系也是显著的。

由此可见,制度能够规制行为的公平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不管是对法学组还是非法学组、男性还是女性,均能够起到显著的规制作用。当然,其对法学组的规制比整体情况的相关度更高,也表明法学组更能够接受制度的规制。

另外,在被试者作为第三方裁判的第三、四阶段中的惩罚率也有不同。第三阶段被试者的惩罚仅仅是无成本的,因此惩罚率较高。而在第四阶段中,由于被试者是作为路人甲的第三方裁判,其如果对分配方案认定为“不公平而且无效”是需要付出 2 个货币的成本进行惩罚。所以,其裁判得分越低,越需要自己付出成本进行惩罚,因此在行为上就越是公平。而在该问题上,分配方案是随机的(分配 $1-5$ 个货币),分配金额在大样本下平均为中位数的 3 个货币左右,低于 3 个货币的分配方案(比较不公平)也占将近一半。法学组和非法学组的裁判平均得分为 -0.011 和 0.047 分,虽然法学组略低于非法学组,表明法学组更愿意自付成本进行惩罚。但是两组都仅仅在 0 分上下,距离 -1 较远,也不足 -0.5 。由此可见,个人虽有一定的公平感,但是其自付成本进行裁判惩罚的动力较低。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建设,由制度进行公平惩罚并承担惩罚的成本。

四、理论探讨

(一) 公平是合作的基础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可以获知,公平不仅是道德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在社会实践中真真切切地影响决策与互动的重要因素。前述分析表明,公平是人类较为普遍的一种道德情感或行为模式,青年人的公平感和公平行为较为普遍。

现有演化博弈的仿真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公平是维系社群合作的基本策略,因此能够成为人类的基本策略或者天性(阿克塞尔罗德 2007; 阿克塞尔罗德 2008)。而公平正义则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其不仅为演化博弈理论所论证,也为部分心理实验所支持(Hamann et al. 2011: 328 - 331)。在道德哲学上,罗尔斯也有相关论述,“与此相对照,在一个由作为公平的正义调节的社会系统中,对他人的善的认同,以及对作为我们的善中的一个因素的他人活动的欣赏,可能发展得相当有力。但是这种发展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正义原则中已经隐含着互惠性。由于这些原则提供的稳定的保证,人们将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感”(罗尔斯,1998: 503)。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公平的演化博弈基础,表明公平的情感是基于互惠行为的长期利益均衡而沉淀下来的优势策略。这些优势策略,作为演化中的长期优势策略而沉淀为人类的本性,成为多数人先天的类似于本能的本性。而关于公平正义的人类天性,穆勒也指出,“正义的感情也许是一种特定的本能,或许像我们的其他本能一样,也需要受一种高级理性的控制和教导”(穆勒 2008: 42)。这种本性,其在行为及其效果上也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不公、维护正当的特征。

前述第三部分第一点的数据也说明,分配、交易和惩罚等不同类型的公平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它们互相支持,均是维系社会合作和激励的重要基础之一。说明只要团体进行协作,就需要公平正义。休谟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甚至在建立最不道德、对一般社会的利益最具毁灭性的原则之上的那些社会,其中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它们既通过私人利益、也通过虚假荣誉而约束每一个成员去尊奉。人们经常注意到,匪寇和海盗如果不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新的分配正义,不恢复他们对其余人类已经侵犯的那些公道法则,他们就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有害的联盟”(休谟 2006: 61)。

(二) 公平感与公平行为仍存在差异,公平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

由实验数据可知,从公平感到公平行为,从分配公平到惩罚公平,均有一定差异。第二阶段的平均分配金额高于第一阶段,表明虽然有一定的公平感,但其付诸行动时依旧需要制度的保障或者强制。而第四阶段较低的惩罚率也表明,在需要自己付出成本维护“他人之间的公平”时,公平感转化为公平行为的比例较低,非法学组尤其明显。因此,有必要以适宜的制度,保障基本的公平。对此,罗尔斯认为,“无论一种正义观念在其他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使它不能在人们身上产生出必要的按照它去行动的欲望,那么它就是有严重缺陷的”(罗尔斯,1998: 457)。米塞斯也非常强调行为的价值,认为“价值不总在于言语和教条中,它只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当中……但是只有当它们真正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时,它们才能影响人类事件的进程”(米塞斯 2010: 78)。本实验及相关实验表明,当惩罚的威胁存在时,一些被试者就会将分配做得更公平(Fehr & Fischbacher 2004(b): 185 - 190)。因此,为了能够建立起长久而稳固的社会合作,为了防止自利行为妨碍社会合作,对这些自私者需要强制力的规制。惩罚不仅避免了合作的衰弱,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回合中甚至促进合作的增长。所以,如果惩罚机制一开始就建立,则合作兴盛;一旦没有惩罚机制或者其被废弃,则合作就衰落。

但制裁也是有成本的。如果仅仅依靠第三方自付成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制裁,其效果有限。因此,还是需要制度性的制裁,有必要以国家制度或者第三方裁判的方式提供规制和裁判服务。从人性的角度看,是为了更好地克制人性的激情或自私。

而在第三方惩罚实验中,第三方仅仅是事件的被动观察者;因此,除非有人违规,否则第三方没

有理由惩罚任何参与者。而在实践中,因为第三方的惩罚是有成本的,还因为通过惩罚并不能获得未来利益(因为实验是一次性的,而参与者都是匿名的);惩罚违规行为的热情必需强烈到能够超越第三方自己的私利。这意味着,如果惩罚由无私的第三方观察者进行,则我们可以猜测在惩罚的激情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强烈的社会性规则。所以,有必要将信念中的规则(公平正义),以国家或者社会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现实中的制度规则。诺思等制度经济学家指出,“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信念体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人们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果。也就是说,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诺思,2008:47)。当然,在这些规则中,最明显有效的是制定法律,以国家法律提供救济或者惩罚;除此之外,其他非法律的制度规则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三) 法律与公平密切联系,显著影响青年人的公平感和行为

法律/司法是公平正义的代名词,司法活动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本质。前述的数据和内容已经表明,制度性规制能够对行为的公平性产生影响。西季威克曾经指出,公正(justice)首先是指与法律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公正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决定的”,因此,他认为“法庭”就基本上等同于“正义法庭”(西季威克,1993:283)。休谟也指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维护正义的规则,“正义规则虽然足以维持任何社会,可是他们并不能在广大文明社会中自动遵守那些规则:于是他们就建立政府,作为达到他们目的的一个新的发明,并借更严格地执行正义来保存旧有的利益或求得新的利益”(休谟,1996:584)。同时,规则、裁判只有符合公平正义,才有助于社会合作和稳定。

而第三部分实验数据第三点的多方面数据内容已经表明,法律教育能够对青年的公平感和公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法学组被试者更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私”来调整自身对“第三方裁判行为”的评判,这可能是因为相关的法律知识能够影响其对他人的裁判是否公正的判断。这个结果对民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认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往多数人认为提升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这一途径。这个结果对国家社会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该要点分析的内容,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量表得分作为一种分析“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能力,是人类理性能力的一种表现。其在法学组被试者中,能够发挥出推动被试者向普遍“公平”标准靠拢的功用。这可能是因为法学组被试者接受了法律知识,所以他们在进行分析时将法学知识(公平正义的知识)也当作认识的一部分加入分析和评估行为中,进而能够更冷静地排除“自私”的短视干扰,抑制自身的自私倾向。而非法学组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其“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能力却可能更倾向于推动降低对分配行为和“第三方公平裁判”的评价。我们认为,由于其自身缺乏法学知识(公平正义的知识),因此在进行分析、评估和决策时,更容易受到“自私”等私人激情要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其“理性自私”或“冷静分析”的能力更倾向于推动降低对“第三方公平裁判”和“他人”的评价。由此可以推论,因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规则,所以法律教育能够对青年的公平感和公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另外,由于制裁也是有成本的;不管是“路人甲”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国家机关的侦查/调查、裁判和制裁等,绝不是毫无成本地“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应当承认,制度制裁的效果明显却依然有一定限度,而且其成本不低;所以在司法之外还需要辅之以“教育”和“引导”。教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也能够发挥某种程度的效果。国家司法、监管的资源是昂贵和稀缺的,而在诸多场景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场景下,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能够让他们具有更守规则、更公平的观念,进而影响其决策和行为;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

(四) 小结和建议

公平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本问题,而法律又与公平密切相连,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和重要的维护力量。在当今不断推进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健全法律制度,让公平正义

及其裁判惩罚更多地覆盖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要在法律制定中,防止利益群体的意志过多地表达,以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也能够为青年(尤其是社会普通青年)的生存、成长和成功提供一个重要的公平的制度环境。此外,针对青少年的成长特性,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

法律制度对行为的规制和教育作用较强,因此需要加强对青年的法制教育;这样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稳定能够起到较强的作用。现有的政治教育除了各类理论教育之外,还可以考虑增加法学知识的教育内容。

邓小平同志提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现有的中小学、少先队和团委等各个机构,在针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在各方面均有一定举措。相关机构采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法制宣传,帮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观念;采取多种形式,举办专题法制讲座,参观法制图片展览,并且设立法制副校长等。但总体上看,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相对较为简单,更侧重于防止校园欺凌、青少年犯罪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过渡到青年时代之后的新情况,未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在进入青年之后,青年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教育或者技能培训及工作过程中,更为高端的、提升型的法制教育却较为缺乏。因此,有必要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进行更多的法制教育,开设更多的、正规的法律课程。因为现有18周岁左右的青年人高中毕业就读高校和职业教育者越来越多,直接出来就业者越来越少。这对社会的稳定、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均有较强的意义。

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除了法律知识的传播外,还需要加强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教育,这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尤其重要。我国法学院陆续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但基本上为选修课程,并且多以老师授课为主。建议在法学教育中将法律诊所课程设为必修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法律援助机会,使学生有机会处理真实案件和当事人,运用抽象的法律规则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为法科学生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观察和理解社会的途径,利于他们在学生阶段就接触和思考今后从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2. 保障教育公平及就业公平

对青少年来说,教育和就业是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切实感受最为深刻的两个领域,直接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可谓青少年认识社会的“人生初体验”。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体验将侵蚀公正公平理念教育和法治教化的效果。

在教育方面,我国仍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机会差异较大的情况。基础教育存在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在高等教育方面,农村青年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机会远低于城市青年,日益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也使得贫困家庭的青年无力负担。因此教育部门需要将公平贯穿于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生生命全周期”,建立贯穿学生整个教育经历的公平机制,避免弱势学生群体从小学和中学阶段就开始经历失败的学习体验,激励弱势学生群体通过公平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社会阶层移动的志向(郭婧等,2015),以亲身经历诠释公平正义的内涵。

在就业方面,目前不少单位在性别、毕业院校等方面设置不合理的招聘条件,有些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过程没有做到完全公开透明,这有悖于就业公平的原则。大学生就业难成为近年社会的热点。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例如2013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不得对求职者设置性别、民族等条件,招聘高校毕业生,不得以毕业院校、年龄、户籍等作为限制性要求。要求任何高校不得将毕业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规范国有单位招聘,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就业已经成为了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工作。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尽全力保障就业公平,以保障个体尤其是青年对公平的信仰,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

3. 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和上升通道

本文的实验表明,分配公平、评价公平和报复公平均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当青年人不能获得较好的上升空间,获得一定的财富分配的份额,则其充沛的精力可能会由建设性力量转变为报复型的破坏性力量,或者转化为评价方面的抱怨、不满等(廉思 2011)。从法哲学上看,公平至少可以分成报复公平(矫正公平)、分配公平和交换公平(交易公平)三类(易军 2012)。^① 本次实验还未涉及公平中的交易公平的内容,但是推断相关内容也与其他公平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因此,鼓励(激励)和保障青年人的创新、创业活动,为他们制定更好的制度,提供更好的土壤和保障,以分配公平、交易公平的提升,来防止评价公平、报复公平的负面影响。这样一方面能够加快社会进步和繁荣,另一方面亦能降低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

这一方面需要强化社会对青年人创新创业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度上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保障,例如,在创新企业团队的内部治理机制建设中重视公平,以强化凝聚力和激发创新力(郑晓明等 2017)。还可加大保护创新企业团队中“汗水股权”成员的股权和分配公平(石书德等, 2015)。这样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的控制权;同时,青年创业者往往也是没有资金而更多地投入“汗水”,他们的谈判力往往较弱。应在企业内部建设、管理中以公平模式重视和激励员工等(楚江亭, 2010)。

此外,在软环境方面,国家应多出台激励青年正面向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政策,^②以多方面多维度引导青年人在行为上更趋于公平正义,并力争由行为对其思想观念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4. 强化程序性公平

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改革和探索实践中,诸多领域都在强化公平。但对实质公平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出现纷争;同时其成本也较高。而建设程序公平,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激发个体的勤勉与奋斗。当下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注重实质公平和实体权利,而较为忽略程序的公平正义。研究表明,在社会大转型期间,青年人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各项评判中,公平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田丰、孙正昕 2016)。相关研究也表明,至少在青年这个群体,在程序公平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满意度更高(张光、刘伟伟 2008)。在国家各类制度活动中强化程序公平,让青年人对于各类事务有一定的公平满足感,从而更能够消解他们可能出现的对事务结果的负面想法。

5. 全面深化改革,削弱社会不公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下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拼爹拼妈”等词汇,折射出中国现阶段某些领域存在为青年所广泛关注的分配不公平、机会不均和阶级固化等问题,这可能会对青年公平正义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消除这些社会不公现象,最终还需要经济的极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553)。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我们应该全面深化改革,把蛋糕做大,分好,削弱社会不公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为青少年树立和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 2007,《合作的进化》,吴坚实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2008,《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梁捷、高笑梅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① 易军将公平分成四种,在这三种之外增加了“归属公平”。

^② 例如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共青团中央等 51 个中央国家机关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强调对青年的守信问题,进行多方面多部门的联合激励制度建设。

- 楚江亭 2010,《企业员工的自我认同——风险社会的视角》,《管理世界》第7期。
- 高宏佳 2014,《5—9岁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博弈策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婧、匡建江、沈阳 2015,《为青年人提供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英国的愿景与行动》,《中国高等教育》第7期。
- 凯莫勒 科林 2006,《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贺京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廉思 2011,《转型期蚁族社会不公平感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罗尔斯 约翰 1998,《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奎緬 多米尼克 J. F. 德等 2006,《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赫伯特·金迪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米塞斯 路德维希·冯 2010,《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聂薇、斐艳丽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 穆勒 约翰 2008,《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诺思 道格拉斯·C. 2008,《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石书德、高建、张玮 2015,《新企业创业团队股权分配的影响因素》,《技术经济》,第12期。
- 田丰、孙正听 2016,《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3期。
- 王蕾 2017,《从知到行:3—5岁儿童的贡献分配公平原则早期发展及影响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旭阳 2015,《“第三方裁判被收买”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学术月刊》第11期。
- 2017,《从演化博弈看司法裁判的本质及完善——行为策略实验的视角》,《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期。
- 西季威克 亨利 1993,《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休谟 大卫 1996,《人性论》(下),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6,《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熊青 2013,《青年人公正观与社会不公平感关系研究》,《社会心理科学》第9期。
- 2014,《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状况》,《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22卷第5期。
- 易军 2012,《民法公平原则理论之探讨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
- 张光、刘伟伟 2008,《重程序还是重结果——大学生公平感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第11期。
- 赵德雷 2016,《信任与公平——青年社会心态的区域比较》,《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郑晓明、陈昊、龚洋冉 2017,《创业型企业股权分配设计与创业团队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创业型企业的双案例比较分析》,《管理评论》第29卷第3期。
- 周兵、刘成斌 2015,《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Fehr, Ernst & Urs Fischbacher 2004 (3),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Social Norm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5.
- 2004(1), “Social Norms and Human Cooper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4).
- Hamann, Katharina, Felix Warneken, Julia R. Greenberg & Michael Tomasello 2011, “Collaboration Encourages Equal Sharing in Children but not in Chimpanzees.” *Nature* 476.

作者单位: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法律政策分析部(林惠玲)

厦门大学法学院(吴旭阳)

责任编辑: 张芝梅

Column on the Study of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ning for Youth Development

The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 of Laws on Minors Minors Yao Jianlong(1)

Abstract: Regarding the existed ques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towards minors , we should emphatically solve three difficult problems , including the dilemma of responsibility dilu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 the vacancy of protection and punishment measures towards minors who violate the law , and the imperfection in state guardianship system of children in plight. We should try to seldom amend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on minors , and not break its basic framework. Regarding the core issues needed to be solved by legislation , the realistic and feasible solution is revising the existing laws. Regarding the amendment of “law on the protections of minors” , it should be moderatel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elfare law” , the amendment of law should emphatically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 plight and the minors’ right to be protected. Meanwhile ,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prevention law” should b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juvenile law” , we should transform this law into the juvenile code with judicial nature , and hence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Regarding the other relevant laws , we should also amend them correspondently , namely establish the laws on minors as the independent department law , and change the state in which the laws on minors might be subordinate to the adult law.

Keywords: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Prevention Law Child Welfare Juvenile Justice

The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under Process Perspective

..... Luo Jing(16)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situational factors on this process. Through studying youth volunteer teaching programs , we fi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effect , value effect and model effect have played major roles in this process. For the volunteers with clear motives , they have acquired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before participation; while for the volunteers with ambiguous motives ,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fulfillment is higher if they could acquir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The volunteers are more easy to have clear and altruistic motives if the situated situation could recognize that the voluntary service could generate the substantive value; if they could feel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own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fulfillment would be higher. The volunte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form clear and egoistic motives if the situated situation could build up the volunteers’ “exemplary” image; if they could receive more enh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maintain “exemplary” imag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fulfillment would be higher.

Keywords: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Process Perspective Ambiguous Motives Altruistic Egoistic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Youth’s Sense of Fairness and Decision-making

..... Lin Huiling & Wu Xuyang(28)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of western fairness study , we conduct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the models of “dictator experiment” “ultimatum experiment” and “third-party referee experiment” to study the youth’s sense of fairness and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 the youth have the thinking , decision-making or behavior towards fairness with great probability; the gender has some influences on the sense of fairness and decision-making but not significant ,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legal education are relatively large; there are correlation among the subjects' distribution fairness , evaluation fairness and punishment fairness; the institution rul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fairness. The fairness is important basis for human cooperation. There still exists the gap between sense of fairness and fair behavior , this requires certai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erefore , we should ensure the fairness through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 strengthen procedural fairness;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legal education towards youth.

Keywords: Youth Fairness Behavior Experiment Law

Articles

From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Cultural Production

..... *Mei Xiao & Lv Peng*(42)

Abstract: For the second-generation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 they don't passively receive the culture of their fathers' generation , instead they try to create a new type of culture by "destroying creatively" , and hence realize the reproduction of occupational status between parent generation and offspring gene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 the contra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have gone through constant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 and they have become the medium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xactly. For economic elites ,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i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mbedded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For the second-generation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y has embodied the challenge and resistance towards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f their fathers' gener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actors with agency , not just the passive recipients.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is not social underclass's exclusive action ,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forming condition of the class of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Keywords: The Clas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Family Business Soci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Change of Symbol Significance Regarding "Social Man"

..... *Yang Yiyin , Chen Zixin & Yan Yurong*(54)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mediated society , people give more and more media symbol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 the "Peppa Pig Social Man" is very popular in network and daily life , this has induced people's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an". Regarding "social man" as keyword , this study tries to grab ten thousand micro-blog texts , and extract five hundred micro-blog texts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Meanwhile , we also conduct the deep interview with some related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regarding the symbol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man" ,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Big Gold Chain" and "Social Elder Brother" to "Peppa Pig Social Man" , its symbol significance and seeking process are more abstract; there exist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 and shared reality behind. Hence , we could construct positive symbol through media ,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hared culture and shared mentality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or shared reality. The findings have some inspiring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its picture.

Keywords: Social Man Peppa Pig Shared Reality 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

Marital Satisfaction , Marital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Zheng Zhenhua & Peng Xizhe*(63)

Abstract: From 2012 to 2013 , Fudan University conducted a large-scale household sample survey of "post-80s" in Shanghai ci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confli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ost-80s"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for the groups without child ,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only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marital satisfaction; for the groups with one child ,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conflict simultaneously; for the groups with two